

南炳文 吳彥玲 輯校

輯校萬曆起居注

壹

天津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輯校萬曆起居注 / 南炳文, 吳彥玲輯校. — 天津市: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80696-688-4

I. 輯… II. ①南…②吳… III. 明神宗 (1563 ~ 1620) —
起居注 IV. K248.306.6 K827=4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9) 第148729號

輯校萬曆起居注

南炳文 吳彥玲 / 輯校

出版人 / 劉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號 郵編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三河市富華印刷包裝有限公司印刷

全國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889×1194毫米 1/16 印張240.5 字數3100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688-4

定價: 2280.00 圓(全六冊)

ISBN 978-7-80696-688-4



9 787806 966884 >

本書為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點規劃項目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萬曆四十六年正月辛酉朔二日
黃成入庫

大學士方從哲謹
昨二十九日伏蒙

遣文書官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

令臣即出視事。隨該臣具疏陳謝。至初一日復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卿大班禮畢。次於宮門恭祝

萬壽。隨即入閣視事。具見忠愛誠意。朕心慰悅。知道

了。該部知道。欽此。臣跪誦

綸旨。可勝感激。念臣一介草茅。出與不出。何關

萬曆四十六年春

龍筆

國家輕重乃蒙

聖慈時時注念。旬日之內。中使再臨。奏

謝之章。一宿即下。始而佇望甚切。既而慰悅有加。

天語春溫。

聖懷篤摯。公膺徵召。果何修而得此非常之

殊眷也。臣仰戴

隆恩。感極而注。所不竭誠盡力。捐糜同報者。是無復

有人心者矣。然臣因是而竊有請焉。昨吏科之

旨一下。無論著印有人。首垣生色。允累次選過幾二

千人。莫不踴躍歡呼。祝我

日本東京國會圖書館藏明抄本萬曆起居注書影

萬曆十九年八月癸巳朔
憂病相仍實難供職哀懇
聖慈早賜休致以全餘生事臣頃以被言乞休疏復
五上兩月之間又十有餘疏矣伏蒙
聖明特鑒
溫旨疊頒即過大行虧猶蒙
任使即橫誣詆詆猶蒙
矜全此之為
恩真海嶽不足為崇深
天地不足為廣大臣雖剖心糜骨莫能仰冀何敢後

天津圖書館藏明抄本萬曆起居注書影

宸嚴自團身便裁緣臣因事積憂困憂積病困憊已
劇龜勉難支抱此苦情有不得不控陳于
君父者臣本以庸才陋識負重荷艱頻年以來上憂
天譴下憂民窮外憂邊內憂
朝政孜孜矻矻鞭策不前散精勞神固已甚矣自
昨年一挂彈章遂憎多口翩翩之謗源源而來
經月杜門求去不得一旬到閣浮言又興室有
操戈穿將下石在公之時絕少待罪之時常多
惡有遭如此風波而不驚懼失色者觀如此景
象而不愁沮銷魂者臣之憂危如鑄攢心如芒
負背蓋已百倍于往時人非金石何能不病如
臣前疏所陳齒痛妨食耳膿妨聽痔漏妨行此
猶春夏間病耳乃今舊患未平新病又作左臂
左腿時常麻木不能屈伸時常痿軟不能舉動
見今延醫調治咸謂積憂所致病根已深若非
亟為攻除必將漸成癰疽尤須節勞省事假以
歲月庶可望痊今太醫院官朱儒見臣疾可
問而知也夫
內閣非養病之地輔臣非竊祿之官若偃蹇而卧

《輯校萬曆起居注》自序

(一)

筆者最早聽說《萬曆起居注》一書，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在大學學習史學史課程之時。那時已從謝國楨先生的名著《晚明史籍考》、陶元珍先生刊載於《文史雜誌》第四卷第七、八期合刊（一九四四年出版）的《萬曆起居注》一文，以及其他有關史學史著作，得知中國自很早的時候起，就已經開始為帝王記注起居，而現在仍舊存在的大部頭的帝王起居注，乃是以《萬曆起居注》為最早，它為研究近五十年之長的萬曆一朝的歷史，提供了數量很大的寶貴資料。但當時筆者得知的信息，是現存《萬曆起居注》一書祇有一部明人抄本，收藏於天津圖書館善本部，為了保存好這部存世孤本，非有特殊批准手續，不能提出閱覽。加之當時筆者也沒有研究與此書有關的課題，因而沒有設法一睹該書的真面目，也沒有這種想法。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筆者與湯綱先生應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撰寫明朝的斷代史（最初的書名擬為“明代史”，但正式出版時，出版社方面因與該書視為同屬一套叢書的該社所出其他斷代史，在書名中皆不用“代”字，如王仲華先生的

關於魏晉南北朝的斷代史稱“魏晉南北朝史”，林劍鳴先生的關於秦漢兩朝的斷代史稱“秦漢史”，楊寬先生的關於戰國時期的斷代史稱“戰國史”，提出去掉“明代史”三個字中的“代”字，改名“明史”。於是最後該書面世的名字竟與“二十四史”中的張廷玉《明史》重了名），萬曆一朝的政治經濟是筆者承擔的任務之一。爲了完成這一任務，筆者曾前往天津圖書館借閱《萬曆起居注》。其時圖書館方面，按規定祇准用縮微閱讀器閱讀該書的縮微膠卷。這種閱讀方法很費眼力，但畢竟可以達到閱讀的目的，心中甚喜，不顧炎夏的酷熱，上身鑽進縮微閱讀器的罩殼裏，忍受着上百度電燈泡的炙烤，邊讀邊抄。然而好景不長，閱讀數天之後，縮微閱讀器發生故障，閱讀被迫中止。筆者和湯綱先生合寫的《明史》一書中，最終未能使用《萬曆起居注》的資料，這是至今感到非常遺憾的一件事。

一九八八年十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了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萬曆起居注》。這是《萬曆起居注》傳世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此書有了學者易於找到的通行本。在高興之餘，筆者也感到吃驚：原來《萬曆起居注》並非祇有天津圖書館收藏的一個本子。不久，隨着中國與日本學術交流的日益活躍，筆者又讀到了日本學者今西春秋先生《關於明起居注》（一九三四年《史林》第十九卷第四號）、《關於明起居注補正》（一九三五年《史林》第二十卷第一號）、《明季三代起居注考》（載田村實造編《明代滿蒙史研究》，一九六三年十月京都大學文學部發行）等三文，以及山根幸夫先生《關於阿波國文庫所藏〈大明實錄〉》（載《鄭天挺紀念論文集》，一九九〇年三月中華書局出版）一文，這更使我了解到在日本也有《萬曆起居注》一書。於是，筆者對《萬曆起居注》產生了強烈的興趣：此書目前究竟有多少種版本？各版本有何異同？此書的內容如何？在提供研究資料方面究竟有何價值？一系列想要搞清的問題經常出現在腦海之中。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特別是其後半段，爲了解答上述問題，

筆者將許多時間花在研究此書上，在有關部門和友人的幫助下，筆者查閱了中國國內的大量有關資料和原書。此後又在山根幸夫先生的幫助下查閱了日本國會圖書館收藏的原書。數年的調查研究，使筆者對《萬曆起居注》一書的了解在自己原有的基礎上有所增加。

(二)

《萬曆起居注》的價值主要是為兩種場合提供資料：一是明神宗死後其繼任者組織人員為之編寫實錄時，二是後人研究萬曆時期的歷史時。該書編纂的本意是為第一種場合提供資料，但今天講來，其價值乃在為第二種場合提供資料。

那麼《萬曆起居注》在什麼範圍內為研究萬曆時期的歷史提供了資料呢？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應該看一看萬曆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大學士張居正為恢復起居注編纂制度所上奏疏中，所述關於國史館為後日編寫實錄而平時分類編輯資料的規定，這一規定中包括有關於起居注記載資料範圍的規定，並且得到了明神宗的批准，在《萬曆起居注》的編纂過程中被認真貫徹執行。這一規定說：“合令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起居，兼錄聖諭、詔敕、冊文等項及內閣題稿。其朝廷政事見於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專管編纂，事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為次，每人專纂一曹……每月史官編完草稿，裝為七冊，一冊為起居，六冊為六曹事迹。”（見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萬曆起居注》第一冊第二七一頁——二七二頁、第二七五頁）由這段規定可知，《萬曆起居注》祇是國史館為日後編寫《明神宗實錄》而於平時分類編輯的七種資料中的一種，其編輯的範圍並非無所不包，而祇是包括明神宗的日常活動及有關言論、文書和其時內閣大學士的奏疏。在這裏應予注意的還有兩點：

第一，所謂明神宗的日常活動，並不是包括其全部活動，而主要是指其在外廷的活動，至於其在內廷的日常起居則並不包括在內，它們的記載屬於與《萬曆起居注》不相干的另一種

文獻即“內起居注”的任務。明光宗的母親王氏，原來祇是慈寧宮的一個普通宮女，有一次明神宗到慈寧宮看望太后，偶遇王氏，一時高興，“私倖之”，使懷下明光宗。但明神宗並不喜歡這個宮女，事後對此事不肯重提。太后對此事卻很重視，她與明神宗談論此事，明神宗以“無之”相答，於是太后令人拿來“內起居注”與之相辯。面對“內起居注”關於其與王氏那次相遇的記載，明神宗祇好老老实實對太后認輸。這是文秉《先撥志始》卷上和《明史》卷一一四記下的一則史實，這一事實說明了“內起居注”記錄明神宗宮內日常起居的情形。

第二，如所周知，明神宗在萬曆中期之後怠政嚴重，長年不出內宮，不見朝臣。因此，此後其在外廷的活動極為少見，這影響了《萬曆起居注》的記載內容，成為主要是其時內閣大學士的奏疏。本來由於內閣大學士的奏疏多半較長，早在《萬曆起居注》的萬曆中期以前的部分，它就在字數上超過了明神宗的日常活動及有關言論、文書，到了萬曆中期以後的部分，其所占篇幅的比例就更大得驚人了。

《萬曆起居注》記載資料的範圍雖然並非無所不包，但其所涉及的朝政卻是領域廣泛的。無論是官吏任免、禮儀制度、財政經濟、工程建築，還是練軍開戰、法律訴訟、管理邊疆、交往外國，抑或社會風俗、宗教結社、科學技術、文學藝術，舉凡需要朝廷過問的事情，無不涉及。這是不難理解的。明神宗作為其時國家機器的最高首腦，他便不能不去處理與朝政有關的任何問題，而內閣大學士作為明神宗管理朝政的主要助手，在處理其主管的若干具體事務（如組織書籍的編纂）外，對與朝政有關的其他任何問題，也不能不關心，不能不就此回答明神宗的任何詢問，不能不就此主動觀察思考並向明神宗提出建議。這樣，《萬曆起居注》盡管祇記載明神宗日常活動（以外廷活動為主）及有關言論、文書和其時內閣大學士的奏疏，而其涉及的朝政的領域不可能不是極為廣泛的。值得注意的還有，《萬曆起居注》所記載的朝政不僅領域極為廣泛，而且多半是其

時朝政中最重要、最緊迫、急需研究處理的問題，反映着其時朝政的熱點。這也是不難理解的。明神宗和其內閣大學士，面臨的朝政無論何時都是千頭萬緒的，而其精力是有限的，其能思考、處理的，祇能是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以及矛盾突出必須及時處理的事情，與之相適應，《萬曆起居注》也就自然形成了能够反映萬曆時期各階段朝政熱點的樣子。

毋庸諱言，記載明神宗日常活動及有關言論、文書和其時內閣大學士奏疏的文獻，不僅《萬曆起居注》一種，還有據《萬曆起居注》等編出的《明神宗實錄》，以及萬曆時期內閣大學士的個人文集（或奏疏集）等。明人編刻個人文集的風氣很盛，嘉靖之後更是熱情高漲，因此萬曆年間的內閣大學士，多有自己的文集，或由親友編成，或由本人親自編輯，還有的專門將入閣期間的奏疏單獨編輯成書。但這些文獻在記載明神宗日常活動及有關言論、文書或其時的內閣大學士奏疏上，皆不如《萬曆起居注》收錄齊全而準確。

《萬曆起居注》之所以收錄齊全，原因在於其編輯宗旨乃是為後日編寫實錄積累資料，因而不能不求齊全。這正如大學士張居正在其建議恢復起居注編纂制度所上奏疏中所說：“照得今次紀錄，祇以備異日之考求，俟後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有宣諭，直書天語，聖諭、詔敕等項，備錄本文。若諸司奏報，一應事體，除瑣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加刪削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於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無致混淆。”（見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萬曆起居注》第一冊第二七四頁）這種“凡有”、“直書”、“盡載原本”之宗旨，自然就會使《萬曆起居注》所應載範圍內的有關資料在其中收載得相當齊全。再加上該書的編纂是隨着事情的發生而逐日及時進行的，無時日過久資料散失之虞，這對保證其收錄齊全，也有很大作用，而反觀《明神宗實錄》諸書，其情況就大有不同了。如《明神宗實錄》，與歷朝所有的實錄一樣，其編寫目的並不是編

成最後的史書定本，而祇是爲了給後日編寫最後的史書定本即紀傳體本朝史作史料準備，但它畢竟較其編寫的重要依據之一《萬曆起居注》離最後的史書定本更近了一步，它對《萬曆起居注》的有關記載不可避免地要有所取捨，這從其編寫體例來說是無可非議的，但在保留盡量多的有關資料供後人研究使用上，顯然就無法與《萬曆起居注》相比了。內閣大學士的文集（或奏疏集）在收錄其人的內閣奏疏時，一般會盡量收全。但是，由於這種文獻往往編輯於其人生存的晚年或死後，集中完成於一段時間之內，資料的收集就難免發生因散失而遺漏。此外，本人或親友爲內閣大學士編輯文集（或奏疏集）時，因利害名義相關，或有故意刪削改寫某些篇章或段落之事發生。因而這種文獻在有關方面也往往不如《萬曆起居注》收錄齊全而準確。至於沒有編刻文集（或奏疏集）的內閣大學士，《萬曆起居注》所記其入閣期間所上奏疏，就更屬世上所稀有、甚至所獨有的了。

筆者曾將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萬曆起居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的《明神宗實錄》和臺灣文海出版社出版的《李文節集》所收大學士李廷機在萬曆三十五年閏六月至十二月、三十六年五月至三十八年四月所上內閣奏疏（李廷機擔任內閣大學士的時間爲萬曆三十五年閏六月至四十年九月，但因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之《萬曆起居注》祇存其中的以上兩段時間的記事，祇好以三書所記以上兩段時間李廷機的奏疏作比較）作了一番對比，得知：這兩段時期內李廷機所上奏疏總數爲一一五篇，《萬曆起居注》收錄一一四篇，僅失載一篇，所收諸篇皆爲全文錄入（發現漏字一百餘，當爲抄寫之誤）。《明神宗實錄》僅對三十八篇摘錄部分段落或述及該篇奏疏所述內容，根本未提及者七十七篇。《李文節集》收錄一〇七篇，失載八篇，所收各篇間有刪削，總數近兩千字。這些統計數字在說明《萬曆起居注》收錄有關資料最爲齊全準確上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證據。在對比的過程中，筆者還發現了數處《李文節集》顧忌李廷機的名義而作出的刪節（如萬曆三十六年九

月二十三日上奏的一篇奏疏，刪去了李廷機與名聲不好的沈一貫一伙人的關係的一段話），對於分析《萬曆起居注》收錄有關資料最為齊全準確的原因，極有好處。

《明神宗實錄》等在收錄有關資料方面不如《萬曆起居注》準確的原因，主要是在輾轉抄寫、改編、綜合、潤色文字的過程中，難免發生失誤。這些失誤多半是無意的，但因數量頗多，對留給後世準確的歷史知識極為不利。如《明神宗實錄》卷四五八萬曆三十七年五月辛巳朔記事載：“輔臣李廷機乞放。”這即是一條誤載。《萬曆起居注》所載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十七日李廷機所上“乞放疏”中有“臣今年乞休十有三疏”一句話，由之可知，在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十七日以前，李廷機在此年所上乞休奏疏總共應是十三篇；而據《萬曆起居注》所載其奏疏，它們分別上於此年的正月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二月九日、十七日、二十三日，三月一日、七日、十九日、二十五日，四月八日、十七日、二十八日，五月八日。可見絕無此年五月一日李廷機上疏乞休之事發生。《明神宗實錄》的這一失誤，當是由於編寫者疏忽，看錯了時間。《萬曆起居注》在編纂過程中，主要是照錄原文，基本上不用改編、綜合、潤色文字，其所收錄有關資料，失誤較少，實為當然。

綜上所述，《萬曆起居注》所記資料雖然限於明神宗的日常活動（以外廷活動為主）及有關言論、文書和其時內閣大學士的奏疏，但其所涉及的朝政卻是領域廣泛，而且多半是其時朝政中最重要、最急迫的問題，在記載同類資料的文獻中，它也是收錄最齊全、最準確的一種。由此看來，研究萬曆時期歷史者，對它確應重視。

（三）

通過調查，筆者還得知，《萬曆起居注》的版本既非祇有天津圖書館的藏本，也並非上文提起的幾種之外再無其他，而是數量頗多，至少有十種。

其一為前文所說的天津圖書館藏本。它是一九〇八年天津圖書館建館後，至遲到一九一三年該館改稱“天津直隸省圖書館”之前，該館通過採購而入藏的。該本係明人所抄，共五十冊，分裝七函，可稱天津明抄本。其記事範圍起萬曆二年至四十三年，中間或有殘缺，實際共記四百零四個月之史事，其文字訛誤、遺漏的錯誤相對來說較少。這是現存記事較多、錯誤較少的兩種版本中的一種。

其二為前文所說的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據山根幸夫先生的文章，該書最早屬阿波國文庫，後可能因明治維新時期發生了財政危機而將之賣出，約在明治十六年被帝國圖書館購進，後因帝國圖書館合入國立國會圖書館而成爲現在的收藏狀況。該書入藏阿波國文庫之前，當是由長崎而從中國輸入日本的。此本可稱日本藏抄本。值得注意的是，該書不是單獨存在，而是與明太祖至明穆宗的各朝實錄、泰昌起居注及部分天啟朝起居注湊成了一套書，總名稱爲“皇明實錄”。其各冊的封面也是題爲“皇明實錄”，與其他部分的各冊相同。其記事起於萬曆二年正月，止於萬曆四十八年八月，除去中間殘缺者，共有五百四十五個月，它也是現存記事較多、文字錯誤較少的兩種版本中的一種。

其三為北大元年明抄本。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除據它影印出版或據它抄出者外，其所記萬曆元年的內容，爲其他版本之《萬曆起居注》所不載。

其四為北大五年及六年抄本。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或謂抄於明代，但從該本不用抬頭頂格書寫的表敬方式來看，其說值得懷疑，很可能是清代。其所記爲萬曆五年及萬曆六年正月至三月的事迹，凡十六個月（萬曆五年有閏月）。這十六個月的事迹在天津明抄本及日本藏抄本中都有記載。

其五為傅氏藏舊抄本。此本著錄於藏書家傅增湘的《藏園羣書經眼錄》中，乃傅氏於一九一三年從“四明書坊”購得。記事範圍同上述北大五年及六年抄本。此書原書筆者未見，從

其記事範圍及傅氏藏書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後的散失情況分析，其殆即上述之北大五年及六年抄本。

其六為北大抄天本。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它為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間的某一年或某幾年，由天津藏書家姒兼山雇傭抄手四人，據天津明抄本抄出。先為姒兼山本人收藏，約於一九四六年秋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之間轉歸北京大學圖書館。其記事範圍完全同天津明抄本，但有許多抄誤之處。

其七為天津元年民國抄本。藏於天津圖書館。民國年間據北大元年明抄本抄出，記事也是萬曆元年的十二個月。最初在天津圖書館書庫中單獨存放，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被編為第八函，與天津明抄本合成一書。同時合進來的還有《萬曆起居注校勘記》稿本二冊，它被編成了第九函。這本校勘記沒有註明作者，也沒註明校勘何種版本的《萬曆起居注》，據筆者考證，其作者應為姒兼山，其校勘對象為天津明抄本，並兼校北大抄天本，凡校漏文、誤字等一七五四處。

其八為臺灣舊抄本。藏於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筆者未見其原書，據黃彰健先生《明神宗實錄校勘記·明神宗實錄校勘記引據各本目錄》，該本收有自萬曆二年正月至十九年七月斷斷續續凡一百八十二個月的記事。其中包括萬曆四年九月和十年正月至三月等四個月的記事，如果此說屬實，則將是十分可貴的，因為其他各本《萬曆起居注》皆缺這四個月的記事。可惜，經託人調查，此乃誤記。

其九為定陵抄天本。收藏於北京定陵博物館。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發掘定陵時，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將天津明抄本借出，由參加發掘的考古工作者照抄一份而形成的。

其十為北大影印本。此即前文所述一九八八年十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的那一種。其底本是北大元年明抄本和北大抄天本。此本為廣大史學工作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的是未選最好的本子作底本，此為美中不足。

其十一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影印本。其本題為

《明抄本萬曆起居注》，乃二〇〇一年十一月據上述天津圖書館藏明人抄《萬曆起居注》、天津元年民國抄本《萬曆起居注》、姒兼山所撰《萬曆起居注校勘記》三書影印而成。

回顧以上所述，若如筆者所說，北大五年及六年抄本與傅氏藏舊抄本確是一書，那麼現存筆者所知的《萬曆起居注》的版本，恰為十種。決定修《萬曆起居注》始於萬曆三年二月，但隆慶六年六月明神宗即位至始修《萬曆起居注》共二年多的事迹當時也決定追記下來，又明神宗死於萬曆四十八年七月，這樣，《萬曆起居注》記事所涉及的月份應為五百九十五個。但日本藏抄本包括有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即明神宗死去的下一個月的事迹，所以，《萬曆起居注》記事實際包括的月份應為五百九十六個。這個數字，上述十種版本都沒能達到。其中國內現存記事月數最多者為北大影印本和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影印本。

按照張居正上疏建議恢復編寫起居注時的意見，起居注寫出後，是不准翻看的，要放入櫃中，“用印封鎖”、“永不開視”。但後來實際上並未能認真執行，現存不少資料反映着其時內閣大學士隨意閱覽的實情。另外，在編寫《明神宗實錄》時又肯定是要提出參閱的。《萬曆起居注》雖然從未正式刻印，但卻能流傳於世，其原因當即在此。既然人們有機會看到它，就可以將之傳抄出來。明人的私家目錄中已有《萬曆起居注》的記載，這是明代私人已擁有此書的证明。今存各種抄本，當即這些傳抄本的遺存或再傳抄。

以上即是筆者關於《萬曆起居注》研究的大體情形和粗淺收獲，其詳見於拙文《影印本〈萬曆起居注〉主要底本的初步研究》（載王春瑜主編《明史論叢》，一九九七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萬曆起居注〉的版本》（載《史學集刊》一九九八年四期）、《〈萬曆起居注校勘記〉考述》（載《南開學報》一九九九年四期）、《天津明抄本和日本藏抄本〈萬曆起居注〉》（載《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二〇〇〇年四期）、《〈萬曆起居注〉、

〈明神宗實錄〉和〈李文節集〉中的李廷機內閣奏疏》（載臺灣中國明史研究學會主編《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二〇〇一年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出版）中，有興趣者歡迎參看和批評指導。

（四）

筆者的妻子吳彥玲，是筆者在南開大學歷史系讀書時的同學。她畢業後因在中學教書，雖一直教歷史課程，但沒有時間進行深入的專題研究。一九九四年退休後，做家務之外，有了較多的空閒時間，決定在深入的專題研究上下點功夫。她清楚地了解筆者對《萬曆起居注》的研究狀況，目標即選在參與於其中。有一次筆者對她談起：現存各種版本的《萬曆起居注》雖都是殘本，但內容互有交錯，除共同擁有的部分外，尚有若干部分僅在某一殘本中保存着，若將各本共有者和獨有者輯錄出來，並加以校勘，即可得到一個近乎完整的輯補校刊本，使《萬曆起居注》基本恢復原狀。彥玲聽後，當即興奮起來，提議：“咱們倆個一齊搞吧，我作你的助手。”這使筆者也興奮起來，兩人竟如頑童似地食指緊勾，並大聲喊出：“拉鉤扯吊，一百年不許倒。”於是輯補校勘《萬曆起居注》的夫妻店馬上開了張。雖然由於筆者還承擔着其他教學和研究任務，不能全力以赴地從事此項工作，但我們二人仍然抓得很緊，一有空暇，即投入其中。二〇〇六年二月，當我們已經完成大半任務時，彥玲突然中風故去，剩下筆者一人只身繼續其事。由於這是一生中與彥玲惟一的一次深入專題研究合作，筆者很在意，因而干得更賣力，真正地進入了化悲痛為力量的境界。到今天——二〇〇九年二月九日，筆者終於完成了這項十幾年來一直牽心掛肚的輯校任務。手撫擺滿書案的二十六袋（冊）書稿，感慨萬千，不禁熱淚盈眶。淚眼模糊中似乎看到了彥玲正推門笑臉走來。筆者極想告訴她：“我們的又一個兒子誕生了。”但竟說不出一個字來。而後即是放聲大哭，哭聲迴蕩在房間裏，其中包含的是無限的思念、哀痛和無奈。

(五)

這部輯校而成的新版《萬曆起居注》，除輯錄、校勘之外，還加了標點。爲了區別於其他版本，定名爲《輯校萬曆起居注》。它共收錄記事五百七十四個月，距離理想的足本五百九十六個月，祇缺二十二個月，包括隆慶六年六月至十二月、萬曆四年正月至三月及九月、十年正月至三月、十一年正月至二月、二十五年十月、四十三年一至五月，缺者占足本總月數不到百分之四，已經可以說是近似足本了。本書所用的底本爲北大影印本，在本書校勘中稱之爲“通行本”，全書使用該本作底本的年月包括：萬曆元年正月至三年十二月、四年四月至八月、四年十月至九年十二月、十年四月至十二月、十一年閏二月至十二年十二月、十四年正月至十五年三月、十六年正月至十七年十二月、十八年九月至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年十一月至二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七年六月至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四年正月至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六年五月至三十八年四月、四十一年七月至十月、四十三年七月至十二月，凡四百十六個月。其餘年月，使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作補充，在本書校勘中此本稱爲“日本本”。使用此本作補充的年月包括：萬曆十三年正月至十二月、十五年四月至十二月、十八年正月至八月、二十七年五月、三十三年正月至十二月、三十六年正月至四月、三十八年五月至四十一年六月、四十一年十一月至四十二年十二月、四十三年六月、四十四年正月至四十八年八月，凡一百五十八個月。此即本《輯校萬曆起居注》記事比當今國內尚存記事最詳的《萬曆起居注》版本多出的月數。本書選用通行本作底本的四百十六個月中，萬曆元年正月至十二月共十二個月記事在通行本中是影印自北大元年明抄本，即影印自該部分記事的最好版本，因而本書該部分記事等同於以最好版本充作了底本。至於本書選用通行本作底本的其餘四百零四個月記事，在通行本是影印自北大抄天本，這部分記事的底本選擇顯然應屬